

(1950 ~ 2000)
五十年來的經學研究

林慶彰 主編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五十年來的經濟研究

林慶彰 主編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五十年來的經學研究

林慶彰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臺灣學生，
2003 [民 92] 面；公分

ISBN 957-15-1171-4 (精裝)

ISBN 957-15-1172-2 (平裝)

1. 經學

090

92001794

五十年來的經學研究 (全一冊)

主 編 者：林 慶 彰
出 版 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發 行 人：孫 善 治
發 行 所：臺 灣 學 生 書 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00024668

電 話：(02) 23634156

傳 真：(02) 23636334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

印 刷 所：宏 輝 彩 色 印 刷 公 司
中和市永和路三六三巷四二號
電 話：(02) 22268853

精裝新臺幣四三〇元

定價：平裝新臺幣三六〇元

西 元 二 〇 〇 三 年 五 月 初 版

09010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ISBN 957-15-1171-4 (精裝)

ISBN 957-15-1172-2 (平裝)

總 序

出版與人類文明發展的關係、出版社與學術文化發展的聯繫，都是不必再予強調或說明，早已廣為各界所知之事。但一家出版社專以學術書刊為其出版內容，專以服務學林為宗旨，為數畢竟尚少。學生書局四十年前創業時，卻選擇以此為經營目標。四十年間，凡出版學術論著幾千種，創辦《書目季刊》等學術期刊若干種，與學界廣有聯繫，並獲圖書金鼎獎六座，為學術發展貢獻的心力與物力，學界無不感謝。

書局的出版，以發揚中華文化為目的，故其出版品以史料暨圖書文獻學、語言文字學、經學、文學、哲學與宗教幾個部分為主，長期支持相關學門的研究與出版。因此，書局事實上也是一所重要的學術機構，它在這四十年間，參與也見證了臺灣這些學術領域的發展。

這四十年，恰好是臺灣從政府播遷時的風雨飄搖、百廢待舉，到逐漸穩立而發展的階段。政治、經濟、社會都在變化之中，學術研究亦不例外。四十年來，一步一腳印，奮鬥的歷程，獲致的成果，彌足珍貴。尤其是相對於大陸，在大陸實施三反、五反、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之際，中華文化之發揚，是臺灣在歷史上不可抹煞的貢獻。這裡面有許多成果，後來也對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後，重新接上中華文化之大流頗有裨益。學生書局所出版的新儒家相關著作，即為其中一個

明顯的例證。

因此，欣逢書局四十周年，我們覺得紀念它最好的方法，就是編一套叢書，回顧這幾十年來臺灣在中華文化的探究上做了些什麼。審茲舊躅，既可策勵將來，亦足以紀念此數十年間書局與學界共同努力的情誼。

回顧，仍從政府遷臺後起敘，照覽較為周全。所論，則以臺灣地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為限。分圖書文獻學、語言文字學、經學、文學、哲學與宗教五部，供未來研究臺灣學術研究狀況者採擇。

學術史的整理，本身就極具學術意義。現在我們回顧這五十年的發展，已經有許多人許多事不可考、許多書刊論文找不齊了，倘不整理，將來必就湮滅；臺灣在中華文化研究上的貢獻，可能也會遭到漠視。因此，這個工作，其實也是刻不容緩的。本叢書受限於客觀條件，或許尚未能全面如實反映整個五十年間所有的成就，但希望能以此為嚆矢，呼籲大家一同來正視當代學術史的研究。

黎明

序

儒家經學是何時傳入臺灣的？雖不一定可以得到確切的答案，但鄭成功遷臺時，隨行的官員不少是讀經典的儒士，已為臺灣撒下傳播經典的種子。雖然如此，從各種有關的記錄，清朝統治臺灣近兩百年，學者有關經學的著作卻相當少，如要和乾嘉時代的經學著作相比，臺灣一地可說是化外之民了。追究其原因，當時士人僅以讀經典作為參加科舉的敲門磚，雖有儒學的傳播，卻少有學者專注於經典的研究。

日治時期情況非但沒有改善，且因研習漢文不方便，情況更加惡化，能專心於經學研究的學者少之又少。日治末期，不少臺灣的知識分子到日本、歐美留學，學得最新的社會學方法，利用這種方法來研究經典，是一種相當新的嘗試。林履信研究《尚書·洪範》，郭明昆研究《儀禮·喪服》，都得利於社會學方法的應用。

這些以新方法研究經典的例子本就不多，且研究成果都用日文發表。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國民政府接收臺灣，隨後國民政府又播遷來臺，重新恢復漢文，日治時期研究經典的方法完全中斷。對重新開始使用漢語的臺灣同胞來說，要研究儒家經典，宛如牙牙學語的小孩，一切都得重新開始，這是為何《四書淺說》、《四書白話句解》等書在光復初期大為流行的原因。

中國大陸淪入共產黨之手，是件大不幸的事。但保住臺灣，播遷

來的學者成了宣揚經學的新種子，使臺灣成為發揚經學的唯一聖地，則是不幸中的大幸。當時來臺的經學家有陳槃、屈萬里、戴君仁、高明、陳大齊、王夢鷗等，如以對後來臺灣研究經學的影響來說，以屈萬里、高明兩位最為重要。當時屈萬里先生在臺灣大學任教，後來他的弟子除在臺灣大學外，分布在中央研究院、東吳大學等。高明先生本在省立師範學院（今臺灣師範大學）任教，後來創立政治大學中研所，他的弟子除在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外，分布全臺灣各大專院校，這些弟子把老師種下的經學幼苗，灌溉成綠蔭濃密的大樹。

綜合民國四十至六十年代來加以觀察，經學除了有上述大師的宣揚外，最關鍵的因素應該是：

1. 各級學校講授經學課程：

初中階段在「國文」課本中選讀部分經典文字，高中階段編有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將《四書》的大部分章節納入基本教材中，大學聯考也列入考試的範圍。大學的國文學系和中國文學系，將大部分的經典列入必修或選修。

2. 設立碩士、博士班：

從省立師範學院、臺灣大學開始，各個學校陸續設立國文研究所或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所中經學課程佔了相當的分量，以經學為專業的學生所佔比例相當高，至民國九十年為止，累積的經學學位論文即有數百篇之多。

3. 編輯經學通俗讀本：

當時來臺的經學家，為應因學生和社會人士的需求，編輯了不少經學的通俗讀本，如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的《國民基本知識

叢書》中有屈萬里先生的《尚書釋義》、《詩經釋義》，正中書局出版有屈萬里先生的《詩經選註》、王夢鷗先生的《禮記選註》，這些書不但可作為大學生修習經典的教材，也為經典的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正當經典在臺灣蓬勃發展時，對岸的中國大陸於一九六六年發生了文化大革命，經典被扣上封建遺毒的大帽子，研究經典的學者大都被清算，各級學校也都被迫停課，從此進入經典研究的黑暗期。如有關於經典的著作，大都以馬列的觀點大肆批判，經典受到如此激烈的摧殘，已奄奄一息。從此，研究經典成了一種禁忌，經學這個學科也從各級學校的課目中消失，圖書館的圖書分類更見不到經學的類目，傳統的經學書也祇得流離失所。十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經學的研究稍稍恢復，但因以前的經學傳統完全中斷，要趕上臺灣，至少要再三十年的努力。這也是前文提到台灣是經學研究的唯一聖地，大陸的自我毀滅，反襯出臺灣維護傳統文化的用心，也造就了臺灣「經學王國」的封號。

在這經學王國裏，並不是沒有可憂心的事，民國八、九十年代以來，臺灣本土化的呼聲越來越強烈，所謂本土化，就是要強調臺灣的主體性。什麼可以反映臺灣的主體性，在學校課程方面，就是要增加臺灣文學的課程，甚至設立臺灣文學系、臺灣文學研究所。現在設有臺灣文學系、所的學校還不多，但在中國文學系、所中挪出部分中國文學的課程，改開臺灣文學課程，也是必然的事。哪些課程應該被取代，最先受影響的是小學、經學的課程，也就是本土化壓縮了小學和經學的空間。由於臺灣文學的課程越開越多，許多研究生選擇以臺灣

文學作為學位論文也加倍的成長，這又奪走了部分想研究經學的學生。研究經學的學生雖逐年減少，但因有數十年深厚的傳統，至少還能維持小康的局面。如果這種局面持續惡化，三十年後反而要再向大陸取經，此點不可不未雨綢繆。

以上敘述了這五十年臺灣經學發展的簡要歷程。臺灣學生書局要慶祝創業四十周年，想編輯一套紀念叢書，要我擔任「經學」的主編，由於和我個人的專業相吻合，欣然同意。經過數個月的構思，在有限的篇幅之內，我選定《周易》、《尚書》、《詩經》、《三禮》、《春秋》經傳、《四書》、經學史、經學文獻整理等八個類別，分別邀請專研各經的青壯代學人撰寫。各文旨在就這五十年間各經研究的成果作歸納分析，不但有總結近五十年成果的意味，也含有策勵將來的期許在內。海內外學者想以最短的時間來了解臺灣近五十年經學的發展，本書是最方便的入門書。

在撰寫過程中，我個人僅提示撰寫方向，並負責連絡事宜而已，要以主編身分來寫這篇序未免有點心虛，但願以上所言不是心虛之下的胡言亂語。

二〇〇二年七月林慶彰誌於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五十年來的經學研究

目 次

總 序	龔鵬程	I
序	林慶彰	III
《周易》學研究	許維萍	1
《尚書》研究	蔣秋華	63
《詩經》學研究概述	楊晉龍	91
《三禮》研究	車行健	161
《春秋》經傳研究	丁亞傑	189
《四書》研究	陳逢源	225
經學史研究	陳恆嵩	253
經學文獻整理概況	游均晶、黃智明	321

《周易》學研究

許維萍*

前 言

筆者對於各時期《易》學的發展，一向抱持著高度的興趣。過去研究的重心多半集中在宋元時期，偶而也向上或向下略做延伸，不過始終停留在古代的階段，而不曾涉及到民國時期。一九九八年是國民政府播遷來臺的第五十年。臺灣學生書局因此籌畫了《五十年來臺灣人文學術研究》系列叢書，其中經學類是由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林慶彰師負責統籌。承蒙林先生抬愛，邀請筆者撰寫《易經》部分的文稿。〈《周易》學研究〉一文，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由於臺灣正值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的敏感時刻，兩岸關係再度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處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中，筆者在處理問題時，也有了不同於以往的思考角度和方向。

在與選舉有關的話題中，最引起筆者注意的是有關「本土」與「外來」的論戰。姑不論此種畫分法背後所隱藏的政治意涵，這樣的議題

*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副教授。

讓筆者聯想到從「文化承傳」的角度切入本文的可能。

《易經》是中國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內涵之一。而臺灣因為受到臺灣海峽的阻隔，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對這部經典的認識卻十分有限。相隔五十年之後，放眼望去，臺灣大街小巷中販售通俗性刊物的書報攤或書店裏，已經不難找到與《易經》有關的書籍；而大學各科系中也不乏以《易經》為主的相關課程。五十年來閱讀《易經》的人口呈現如此快速的成長，箇中原委，十分值得玩味。

《易經》研究在臺灣的種種進展，或可視為中國文化在臺延續的一種表徵。目前我們所得到的觀察是：此地學者對於這種「外來」文化所採取的態度是接納，而非抗拒。其中的原因固然十分複雜，不過筆者願意透過歷史的觀察，將《易經》一書在「文化傳遞」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試做分析，希望藉此尋繹出「《易》學蓬勃發展」表象背後的成因，這部分內容將在本文第一章中呈現。

除此之外，本文也將對臺灣《易》學研究的現況進行述評，這部分將從幾個不同的領域分別進行。由於《易》學涉及的層面實在太廣，本文只集中論述了成果較為豐碩的幾個領域。其中「《易》學史」這個領域因為與本文的關係較為密切，而且是筆者過去投注較多心力的所在，因此在篇幅上要比其他領域多出許多，這是要額外加以說明的。整個部分的內容將安排在本文的第二章。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採取了二條不同的路線：一是「縱的串連」，二是「橫的連繫」。前者主要運用在第一章「歷史的觀察」上，後者則實行在第二章「各領域研究成果綜述」中。所謂「縱的串連」，是指透過一些《易》學事件的陳述，將五十年來臺灣《易》學發展的過程，做一個歷史性的回顧。由於「時間」是構成這部分的主要因素，

因此筆者將此研究方式稱之為「縱的串連」。至於「橫的連繫」，是指透過這個時期不同領域研究成果的評比，勾陳出整個大時代《易》學發展的樣貌。由於側重的部分在各領域研究成果的個別差異上，因此筆者名之為「橫的連繫」。

附帶說明的是，本文旨在反映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九八年這五十年來臺灣一地的《易》學研究成果，論述的範圍界定在這段期間內臺灣學者所發表的與《易經》有關的專書或單篇論文。至於臺灣學者或海外學人（包括大陸）在這段期間內重新刊印的舊作，或是海外學人在臺發表或出版的新作，則不在此列。唯古籍的重新刊印與點校出版，因一部分反映了市場的需求，一部分體現了臺灣學者在整理古籍上所做的努力，因此仍將納入討論。

壹、歷史的觀察

一、1949—1968：最初二十年

（一）渡海來臺的《易》學種子

——從最初二十年學院裏的《易》學研究談起

臺灣的《易》學研究，起步甚晚。根據筆者的統計，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九八年的五十年間，共有一百〇六篇^①以《周易》為研究對象而完成的碩、博士論文。其中，撰寫於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八年者，

① 分別由97人撰寫，詳見本文〔附錄〕。

總共只有五部；而晚近十年（1989-1998年），卻出現了五十七部。從國民政府播遷來臺後，長達二十年的時間內只出現了個位數的《易》學論文，而晚近十年間卻一下子成長了11倍強，這一方面反映了《易經》研究在晚近臺灣的學術領域中，有蓬勃發展的趨勢；另一方面，也顯示了早期《易經》研究在學院裏的貧瘠。

以臺灣大學及臺灣師範大學的研究成果為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第一部《易》學論文出現在一九七三年，^②距離一九四九年已經過了二十五個年頭；而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的《易》學論文雖然出現較早，但距離一九四九年也已經有了十年。^③可以這麼說，一九四九年以前，屬於臺灣本土的《易》學研究在學院裏似乎是一片空白的，一直要到一九四九年以後，研究風氣才慢慢展開，並且逐漸受到重視。

檢閱當時指導這些論文撰寫的教授名單，可以得知，這些論文是由高明、蔣復璁、林尹、程發軔、南懷瑾、陳立夫、戴君仁、屈萬里、方東美等先生所指導的。從出身背景來說，他們都是從中國大陸遷徙來臺的「新移民」，這些在政治立場上強烈反共，在文化態度上多半

② 撰者為林麗真，題目是：《王弼及其《易》學》。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3年6月，戴君仁指導。同年雖有另二篇碩士論文的出現（郭文夫：《孔穎達《周易正義》質疑——第一部：論評〈周易正義·序〉之哲學思想》，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3年，方東美指導。馮滄祥：〈周易「創造無己論」之哲學精神及其現代意義〉，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3年，方東美指導），但皆出於哲學研究所。

③ 第一位以《易經》研究獲得學位的臺灣師範大學畢業生是王忠林，題目是：《〈周易正義〉引書考》（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58年6月，高明指導）。

趨於保守的學者^④們，憑著在大陸時期所打下的國學基礎，來臺後，多數在大學院校裏從事教職。於是，在他們的共同推動下，學院裏漸漸有了以《易經》研究做為專業的人才。至此，《易》學種子在臺灣才萌了芽。

事實上，在第一部《易》學論文出現（1958年）以前，就有人針對「經書是否應讀」的問題，展開一場熱熱鬧鬧的唇槍舌戰。^⑤由於《易經》也是經書的一部分，因此這件事情的發生，相當能反映當時一部分學者的看法，而這在臺灣早期的《易》學發展史上，也是一件值得記載的事。因此以下就設立專節，詳述這件事情的始末。

（二）讀經問題爭議下《易》學的發展

1. 讀經問題的始末

一九五二年六月，《自由中國》第六卷第十期上出現了一篇名為〈堵防時代思潮中的一股逆流〉的社論（頁303），主要是針對新上任

④ 胡適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1月。第5冊，頁577-588）一文中曾經指出國民黨與新文化運動之間的關連。上述諸先生雖然不見得個個都是國民黨黨員，但是他們在文化上的態度，與〈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所述及的國民黨黨員卻是不謀而合的。相關論述詳見下文。

⑤ 關於讀經問題的爭議，早在民國初年就已經啓其端。當時提倡新文化運動的幾個主要人物，像是胡適、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對於「讀經」就是採取一種反對的態度。他們的「激進」，曾經引發當時在文化上較保守的若干人士的抨擊。雙方於是展開激辯。民國41年在臺灣發生的論戰，或可視為民國初年讀經爭議的延續，但是因為事件發生在臺灣，因此筆者特別將它獨立開來。

的考試院院長賈景德所主張的「今後的考試，要將四書五經列為必考科目」^⑥，提出強烈的質疑。該社論指出：「自章學誠先生說出『六經皆史也』這句啓發性的名言以後，我們讀書人對於四部當中的所謂『經』，應接受章先生這個正確的認識，不應再像耶教徒之信奉新舊約，或回教徒之信奉可蘭經。」然而，有些人因為「慨乎文化的病態」及「道德的墮落」，於是，在「時代演進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今日」，仍然「主張讀經考經」，這無異是「求治於古方」，「乞靈於聖廟」！撰者進一步指出，主張考經的人，「其理由據說是『恢復中國固有文化，發揚中國舊有道德』」。但是，「如果以為共黨毀滅中國固有文化和道德，我們反共就必須恢復共黨所毀滅的，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想法。」因為，「共黨所要毀滅的不只是固有文化和道德，而是包括人類社會的一切精神力量，尤其是現代化的精神力量更是共黨的勁敵。」然而，「現代化的主要內涵，為科學與民主，以及適存於科學精神和民主制度下的生活方式和行為規範。這些東西，在我國固有文化和道德中是找不出的。」因此，撰者認為，「中華民國目前所迫切需要的人材」，「決不是靠四書五經所可培養得出來的。」如果一定要將經典列入錄取現代化人材的共同必考科目，就是一種「盲目的復古」，或「思想復辟」，而這都是「時代思潮中的逆流」，「必須加以防堵」。

⑥ 這是民國四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新上任的考試院院長賈景德在四十年度高等普通考試及格人員同年聯誼會茶會上所講的一段話裏的重點。這段話後來被記錄成文字，收錄在《考證月刊》第14期上，題目是〈關於考試問題講話〉。後又被收錄在黃力生編：《讀經問題》（臺北：中國政治書刊出版合作社，1953年3月），頁1-4。

這篇文章的主要論點有二：其一，現代人應該拋棄過去那種將經典視為權威的心態，轉從「史料」的觀點去看待四書五經。其二，針對當時的政治情勢來說，讀經、考經不僅無益於反共，而且會妨礙現代化的進程。

細讀該文，撰者並非主張現代人不要讀經，只是反對將經書視為解決一切問題的萬靈丹，尤其對於提倡者冀望透過「讀經、考經」來達到「振衰起弊」的目的，更以為不切實際。作者之所以撰文質疑考試院院長的動機在此，主要理由也在此。

此文一出，立刻引起兩極化的反應。同年（1952年）七月，《反攻》半月刊第六十三期更以「論讀經問題」專號的形式，刊登了七篇與此議題有關的論文。在該期卷首的社論中，編者提到：

這兩個月來因攷試院賈景德院長公開發表考經與讀經的意見，引起《自由中國》半月刊著論反駁，更因此一雜誌的社論，引起各方面許多議論，對於《自由中國》的社論有反對的，也有同情的。蔣總統且於本月中發表了〈整理文化遺產與改進民族習性〉一篇訓詞，可見這問題關係很大，實在不容忽視。同時很有幾位朋友把他們的大作送到本刊，希望發表，其中也是見仁見智各有不同。我們覺得他們這些意見雖反正不同，亦各言之成理，似有盡量公開發表，以供社會參攷，研究與批評的必要，必須如此，才能辯論出真理來。這是自由中國的好現象，也是自由言論的可貴之處。本刊之所以刊印專號，不外這點意見。（〈本刊的意見——對讀經問題〉，《反攻》第63期，頁2。1952年7月）

一篇社論的發表，可以促使當時總統蔣介石發表訓詞〈整理文化遺產